

## 留星官員帶來哪些變化？



從1992年開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開設了面向中國官員的課程，主要講授公共管理、城市規劃等，學費每人每年10萬元左右。至今受訓的已有8000

多人，級別最高的有市委書記。新加坡教授稱，中國學生很勤奮，但缺少對權力分離重要性的認識。

不是媒體報道，我還真的不知道中國十多年來，有8000多位官員曾在新加坡留學。這些官員現在都在哪裡？他們學成歸來後，給中國的實際發展帶來了哪些變化？除了對這些官員熟悉的人，恐怕沒有多少人知道這些情況。

## 學習之後應見到成效

中國有8000位官員留星，這應該不是一個可以忽略的數字。據稱這些在新加坡學習的市長班成員，是每年由中組部、教育部和各省百裡挑一而遴選的。這些人應該是中國官員中的佼佼者。然而十幾年來，陸續有8000多人接受了這樣的培訓，不僅不為人知，而且也看不出，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產生了哪些明顯積極作用。這多少有些令人遺憾。

大批官員到外國學習社會管理經驗，這在當今世界並不多見。據悉，除了派員到新加坡學習，國家還派員到美國等國學習。從這裡可以看出，我們國家的開放意識的確增強了。可是，派員出國學習，不是觀光旅遊，學習之後，是應該在實際工作中產生效果的。否則，那些錢花得就有些冤枉，學習有走過場之嫌。

留星官員的確需要帶着思考學習。中組部部長李源潮說，「我們把新加坡作為領導幹部海外培訓首選，是因為新加坡的發展經驗對中國有特殊的借鑒作用。」這可能正是高層下決心派員出國學習的用意。有學者說，多年來，新加坡是中國唯一公開聲稱值得學習的國家。可見新加坡經驗，對於我們來說是何等重要。

## 新加坡模式值得借鑑

有人總是認為，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島國，和中國沒有可比性。如果留星官員也這樣認識，那就喪失了前往學習的意義。新加坡也有穩定的執政黨，權力相對較為集中，在那裡生活的75%的人是華人，這些都和中國的情況有些相似。這就是我們可以認真學習的基礎。而且，我們也有城市，也有鄰島城市，這些也都是學習新加坡模式的有利條件。

真誠希望這8000多名留星官員回國後，不是僅僅在「同學」之間建立QQ群中聊聊天，而是把在新加坡學到的好的管理經驗，隨時融入到工作中；認真學習新加坡官員工作負責、廉潔守法的作風；把新加坡較好處理權力與權利、政府與民間、政治與民主、國家與民生等關係的經驗學回來。期待有一批留星官員，能夠在未來的中國改革建設中脫穎而出。

## 何時才買得起房

□禾 刀

5月5日，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淮在此間舉行的「2010河北省城市建設與房地產發展高峰論壇」上表示，中國需要二十到三十年時間達到讓民眾「買得起房」的目標。陳淮說，中國城鎮2009年有純住宅131億平方米，但中國城鎮居民總數2009年末為2.1億戶，戶均不過60平方米，還處於「初步脫困」水平。

不知道陳淮主任的論斷是出於恨鐵不成鋼的心態，還是對當前房價高企的暗中呵護，反正在筆者這樣的旁觀者看來，要二十到三十年時間才能達到讓民眾「買得起房」的目標未免太過驚悚。

這句話或可理解為，當前居民買不起房很正常，因為剛性需求極為旺盛。剛性需求，這是每輪房價飆升時進入視野最多的詞彙之一。從時間上看，陳淮提出的二十到三十年目標，這與我國城市化速度大體同步，看似有一定的合理性。不過，城市化本來就包含妥善解決城農民的住房問題，一則住房問題本就處於整個城市化過程的前部，再則在購房大軍中，到底有多少真是那些進城農民呢？

記得去年4月份，重慶會提出「讓主城雙職工七年的家庭收入，能夠買得起一套房」。七年時間究竟是否合理尚缺社會共識，陳淮主任的二十到三十年目標自然更讓人難以接受。倒不是說市場不存在剛性需求，只是想藉此表明，對眼下的剛性需求必須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尤其要篩掉那些「偽剛性需求」成分，這樣才有可能真正擠掉高房價裡的水分。

## 冷觀國際角色之變

## 世博展現兩岸關係成果

□海 洋



台灣在時隔四十年後參加上海世博會，這是近年來兩岸關係不斷改善和發展的重要成果。兩岸人民特別是台灣同胞，應珍惜台灣重返世博會和兩岸關係改善發展的成果，以進一步增進兩岸關係。

4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上海會見應邀前來出席世博會開幕式的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吳伯雄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等台灣人士。胡錦濤說，上海世博會是北京奧運會後我們中國人舉辦的又一次國際盛會，也是世博會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盛會。從1851年第一屆世博會——倫敦世博會到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近一百六十年間，中華民族走過了從貧弱到奮起的艱辛歷程。本屆世博會在上海舉辦，是包括海峽兩岸中國人內的所有中華兒女共同感到自豪的事情。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上海世博會一定能夠辦成一屆成功、精彩、難忘的世博會。

## 促進兩岸交流合作

胡錦濤還指出：台灣在時隔四十年後參加上海世博會，這是近年來兩岸關係不斷改善和發展的重要成果。台灣同胞在這裡展示奮力打拚取得的成就，大陸同胞為此感到高興。上海世博會一定會增進兩岸民衆相互了解，對加強兩岸交流合作產生有力促進作用。胡錦濤總書記語重心長、寄望深切。兩岸人民特別是台灣同胞，應珍惜台灣重返世博會和兩岸關係改善發展的成果，以進一步增進兩岸關係。事實表明，台灣夠足夠參與世博，這是值得肯定和讚賞的。

一、台灣不忘「中國日」歷史，更珍惜四十年後重返世博，創造「雙贏」未來。

台灣人民不忘昔日世博會的歷史和印象：1970年在日本舉辦了「大阪萬博會」，當時蔣介石指派他的副手嚴家淦訪日，於1970年7月10日主持「中國日」。當時「中國館」共花了150萬美元，由旅美名建築師聿明先生設計，他的助手就是本次設計上海世博會台灣館的建築師李祖原。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後，便喪失了世博會的申辦資格。1970年後，台灣未曾參加世博，此次借重返，打出了「雙城、雙博、雙贏」口號。「台灣外貿協會」董事長王志剛表示，台灣四十年來首度重返世博，對增進兩岸關係，以及向大陸民衆介紹台灣，有非常正面的意義。

二、台灣以「台北世貿中心」的名義參與上海世博會，全力以赴突出中華文化和濃厚的台灣風情。

台灣當局應大陸邀請，以「台北世貿中心」的名義參與上海世博會，台灣館建造在世博園A片區，而參展主題定為「山水心燈」，提倡未來城市文明「回歸自然、回歸心靈」，七大展示內容分別為「山水劇

場、點燈水台、台灣之心、台灣之窗、心靈劇場、城市主題廣場、城市藝廊」，盡顯濃厚的台灣風情，體現中華文化在台灣的繼承和發展。台灣有三個館入駐世博園，分別是具有傳統意味的「山水天燈」館、宣導科技與環保的台北案例館、展示中國玉文化的震旦館。三館齊上，個個精彩。台北故宮製作的影片也從「天子之寶」、「文化之眼」、「普世之美」三方面體現台灣的文化創意，特別是科技的突出成就。二樓點燈水台下方有雙重環狀水池，水池中注滿了日月潭的水，很有特色。

## 重視中華文化傳統

島內媒體報道稱，台灣方面充足準備，都是為了台灣世博會的平台讓「台灣觀起來」，為更多的人認識寶島台灣魅力打下基礎。

此外，上海世博會吉祥物「海寶」同樣飽含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底蘊。「海寶」的創作設計者是台灣設計師巫永堅，他經過數年的嘔心瀝血精心製作，終於作出了令人滿意的吉祥物「海寶」。5月3日晚中央四台《海峽兩岸》特請巫永堅作為嘉賓，讓他介紹自己創作設計上海世博會吉祥物「海寶」的主導思想理念和創作設計歷程。巫稱，堅持中華傳統文化理念才有「海寶」吉祥物的問世。可見，台灣同胞是何等的重視中華文化傳統啊！

三、台灣各界百餘位嘉賓應邀赴上海參加世博會，嘉賓既感謝又認真熱情參觀。

此次上海世博會組委會邀請了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吳伯雄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等島內一百多位嘉賓赴上海參加世博會。開幕當天，台灣館代言人林志玲和陶晶瑩聯袂出席，台北市長郝龍斌也與會，此外，世博會贊助商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和島內芯片龍頭企業聯電榮譽董事長曹興誠也蒞臨捧場。連戰、吳伯雄、宋楚瑜熟遊世博園。開幕首日，大陸海協會領導導兵分三路全程陪同連、吳、宋參觀世博園。睽違世博會四十年的台灣，這次不但熱情參與，還一口氣「三館齊下」。台灣嘉賓參觀了台灣館、

台北館、震旦館及東道主的中國館。參觀後，連戰讚嘆「美不勝收」；吳伯雄感動地說「是最好學習機會」；宋楚瑜激動地說，「世博會是全體中國人的大事，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共襄盛舉，分享榮耀，套句上海話，阿拉就是一家人」。

## 聚首消弭微妙心結

與馬英九關係密切的前「行政院長」劉兆玄，於5月10日到上海，主持台灣館點燈儀式。島內媒體分析稱，從台面上看，劉是以「台灣文化總會會長」的身份登陸，他本人也表示與政治相關的事不會有任何接觸，但劉的成行本身就具有一定政治象徵意義。劉兆玄此行肯定被解讀為馬當局向大陸釋出的政治善意。

此外，連一直阻撓兩岸關係發展的綠營也對世博會「情有所鍾」，「心嚮往之」。一方面民進黨反對兩岸經濟協議，另方面民進黨籍的雲林縣長蘇治芬卻悄悄到上海世博會參觀，推銷雲林的農產品。蘇治芬在接受媒體電話採訪時說，「如果只用政治觀點來看我們，台灣只會越來越沒有競爭力」。民進黨「立委」對蘇治芬的舉動表示肯定，並要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多向蘇治芬看齊。

上海世博會開幕後，持續吸引世界媒體特別是台灣島內媒體的目光。島內媒體紛紛撰文評析，盛讚世博。有的稱，開幕式亮點多，「面子裡子雙贏」。有的稱，「世博聚首」消弭兩岸微妙心結，只要兩岸同心協力，中華大家庭一定能繁榮富強，台灣也就一定能夠圓走向國際之夢。

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



## 重視並改善「人才環境」

人才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環境，就是「人才環境」，它是否能多出人才及能否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重要因素。白雲鄉在《中國青年報》撰文強調，中國欲造「人才大國」，需先轉變「人才環境」。

筆者認為，人才環境的品質高低，取決於其能否滿足人才的需求。真正的人才必有兩大渴求：一是求公平，就是公平競爭和公平對待；二是求激勵，其中就包括得到應得的工資待遇以及被尊重、被信任、被珍惜和被重用。中國如何轉變或改善「人才環境」？筆者以為，這一問題實際就是文化建設工程問題。對此不妨兩步走，首先要加強國家文化建設，改善大的文化環境，其次要加強組織文化建設，改善小的文化氛圍。只有大、小文化環境均能滿足人才的兩大需求了，「人才環境」的改善才算完全到位。

## 增添公平感激動感

無論是改善國家文化環境還是改善組織文化環境，首要目的是讓人才有足夠強的公平感和激勵感。中國的「人才環境」迄今為止確實有所改善，但人才的公平感和激勵感還不很強烈，表明該環境依然存在着許多削弱人才公平感和激勵感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當是政府要務，也是組織領導者的職責。

首先，政府應通過多種形式的改革，重視解決對人才不公或缺乏激勵的問題，營造良好的「人才環境」。例如：政府對國企和事業單位（大學、醫院等）「一把手」的選拔，應多些「公選」，少些「指定」；政府應嚴懲破壞公平競爭的學術不端行為，包括學術壟斷、學術剽竊、學術造假等，對這類行為「零容忍」；政府應面向國有機構全體職工實行「績效工資制」，廢除諸如「大鍋飯和鐵飯碗」一類的人才「零激勵」制度；廢除體制內外「同工不同酬」的制度，倡導「全員合同聘用制和同工同酬制」；大學教育應着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敢於挑戰權威和提出獨到見解的能力。這也是對於人才培養和人才激勵的「人才環境」。

其次，組織領導者的領導方式，決定組織文化乃至「人才環境」的健康與否。胸懷寬廣的領導者，不會嫌棄員工自己有才或自己有錢，也不會壓抑（不會對提出異議的人才進行壓制或排擠）。眼光長遠的領導者，不會任人唯親，而是任人唯賢。他會更愛才，表現為：會議才，更重才，善用才。

現在，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的選人用人觀比企業滯後，這是值得關注的問題。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如今必須提高人員素質，才能強有力地應對當下的「內憂外患」。也就是說，這些單位現在最需要的就是高素質人才。北京市最近公開選拔局處級領導幹部，報名者共11416人，為歷次最多。他們來自四面八方，包括中央在京單位、本市單位、京外單位、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等，其中有海外留學經歷的報名者達506人。面對如此之多的候選者，如何選出最合適的人才，用方需三思。

## 避免人為設置障礙

筆者最近發現，某些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在選拔人才時對候選者的性別、年齡、學歷、職稱和政治面貌等都有很嚴格的限制（如要求45歲以下，教授職稱，中共黨員）。人為設置這些高門檻，實際上大大提高了選拔合適人才的難度，也為人才成長和人才培養設置了障礙。已成材的「大樹」畢竟少之又少，人才選擇餘地也小。而有潛力、值得培養的「好苗子」為數衆多，選擇餘地也大，更利於找到合適的人才，也利於人才培養。

聰明的僱主在選人時會降低不必要的門檻，重點關注候選者是否誠實、對這份工作是否有興趣和有熱情、是否有相關的出色能力，在相關領域是否有成就。內地當紅「江湖藝人」李玉剛，除了對唱戲癡迷，其他什麼也沒有。他刻苦鑽研，自學成才，男扮女裝，惟妙惟肖，表演和唱功比專業演員還專業，因此深受觀眾歡迎，「粉絲」成群。國家專業文藝團體也因看中李玉剛的演唱功力、刻苦精神及所取得的成就，破格錄用了他。單位還為李玉剛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如安排他遠赴澳洲悉尼歌劇院登台表演。如此之佳的「人才環境」，必能使李玉剛更上一層樓，用人才方因此受益匪淺。

總之，改善「人才環境」，須兩步走，首先改善國家文化環境，其次改善組織文化氛圍，自上而下樹立與時俱進的人才觀，營造「尊重人才、信任人才、珍惜人才和重用人才」的文化氛圍或社會風氣。

作者為企業策劃人



5月7日，正在海上執行世博安保任務的山東海警二支隊官兵，用旗語慶祝即將到來的「母親節」。

## 冷觀國際角色之變

□遙 遠

的商機，充分利用會是好事。

另一方面，國際社會也要看到，對於中國而言，這才剛剛是一個開始，不要給予中國太多的期待。另外，中國也要積極地利用好這個平台，更多地參與國際經濟與發展政策的制定。中國還特別需要前瞻性地看到，今後中國的經濟政策需要考量到全球治理政策的影響，特別是在環境政策以及稅收政策上，中國需要充分理解國際社會的關切，切實地在享受全球化好處的同時，承擔與國力相稱的國際責任。如今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已經發展起來了，所以成為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能更好地體現中國所承擔的責任。這也表明，中國以後將在對外援助、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 美國依然能夠「一票否決」

中國需要冷靜地看到，中國在世行地位提升是好事，可能給中國帶來更大影響力，但美國對世界銀行的主導沒有改變，世界銀行的治理結構也沒有改變。在重大事件與政策上，與美國政策相左，就可能會有問題，因為只有美國有最核心的否決權。日本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就成為了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二大投票國，但根本沒有改變在這兩個機構的影響力。比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日本的應對措施因為與美國不合，就遭到冷遇。當下，無論亞洲還是歐洲，都有有識之士在推進亞洲區域的貨幣基金組織與歐洲區域的貨幣基金組織，以制衡面向全球的國際經濟組織。某種程度上說，世界銀行的舉措是個讓步，意在「拉攏」中國，不希望中國走得太遠，否則就會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構成競爭。因此，世行宣布的數字對中國來說更具有象徵意義。如今的局面就是給了中國一些甜頭，讓其實更多苦力。

輿論在認為這項改變對中國「有利」的同時，要求中國「別太高興」的聲音也佔了相當大比例。

這似乎折射出中國作為崛起中國的疲憊和不安：中國成長越快，大國的麻煩來得就越快。從今以後，世界秩序涉及中國的調整很難說對中國是絕對的好事或者壞事。中國要做的是，既然迎來了這種變化，就認真面對它。

事實上，「老三」的頭銜對中國社會早就沒了衝擊力。各種「第一」最近幾年迅速湧向中國，比如全球出口量第一、汽車產銷量第一、全球最大市值企業、全球最大台式電腦市場，世界最大清潔能源基地……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似乎天然地容易成為某個單項的「冠軍」。「冠軍」的稱號雖然動聽，但也有刺：「最大外匯儲備國」的稱號使金融危機中很多國家盯着中國，塞給中國的「最大二氣化碳排放國」稱號增加了中國的減排壓力。即使成為「世行老三」，中國4.42%的投票權也不到美國投票權的三分之一，這與中國GDP與美國的差距大體相當。中國崛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排名第一」並不能決定什麼。美國經濟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經是世界第一，但經歷了半個世紀才掌握了世界主導權。排名第一更多是媒體熱炒的噱頭，並無具體意義。

## 需要承擔更多國際責任

多年來，中國人最大的夢想一直是民族復興，這不僅僅是經濟總量上的復興，也是國民個人收入的提高，國際領域、國際商業規則方面話語權的增加。中國人能夠認識到，中國「東、中、西」差距很大，自身還有很多事情沒做完，國民創造的財富肯定優先用於解決國內問題。如果不顧國內實情，搞一些國際援助，顯然不現實，也不符合民衆的認知。而在國際舞台上，人們不會尊重一個一毛不拔的富翁，因此對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可能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中國民眾並不會有什麼意見。只是中國還不是一個富翁，國民生產總值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超過美國，自然也不會向西方國家提出那些不合乎中國人認知的要求。